

## 从方志记载试探真山墓主

1992年11月浒墅关真山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大墓,《苏州日报》随即发表了《真山——吴王陵?》的特写专稿,这一特大新闻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真山墓主是谁?真山是否为吴国王陵区?一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苏州作为吴国都城并不始于太伯奔吴。《世本》称“诸樊徙吴”,而汉代《吴越春秋》及以后的史志都说是阖闾使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营筑新城,奠定了今天苏州城的基础。由于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西周至春秋早期吴国青铜器都出土在宁镇一带,因此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太伯奔吴之地在宁镇一带。据《吴越春秋》记载,太伯死后葬在无锡梅里。今无锡梅里确有太伯墓、太伯庙,但是现存的太伯墓,史有明文为东汉吴郡太守糜豹所修,现存的太伯庙为明代建筑,梅里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该地为商周聚落的考古证据。

自从1954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簋以来,在丹徒谏壁至大港一带的沿江低山丘陵上已发现二十几座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吴国大墓,这一带被认为是吴国王陵区<sup>①</sup>。

真山一号墓座落在小真山山脊,为甲字形带斜坡墓道的竖穴石坑墓,墓上夯土成冢,其形制与丹徒吴国墓一致,当系春秋吴墓。据墓中出土文物的形制分析,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据苏州博物馆真山考古队调查,真山共有57座墓葬,其中大真山顶峰的主墓封土高15米、直径达50米。这些墓葬的年代有春秋的也有汉代的,所以考古队认为真山是春秋末至汉初的王陵区<sup>②</sup>。

春秋晚期吴国国君有诸樊、余祭、余昧、王僚、阖闾、夫差六人。1984年大港背山顶春秋晚期大墓中出土一件铜矛,据矛上铭文考证,此矛为吴王余昧之物<sup>③</sup>。如果考证不错,那末说明诸樊徙吴之后,吴王死后仍要归葬故土的。王僚是被阖闾派专诸刺杀的,死后葬在今狮子山。阖闾自己葬在虎丘山,这大概是因为伍子胥营筑新城后,吴王正式定居在苏

州的缘故。至于夫差是亡国之君,兵败逃至余杭山即今阳山自刎而死,勾践命越兵每人捧一掬土,把他葬在阳山卑犹之位,决不可能有真山墓那样高的规格。所以真山墓主不可能是上述几位吴国国君。

真山不是上述吴王陵区,那末真山墓主是谁呢?方志中的有关记载为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宋范成大《吴郡志》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西梅里村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吴地记》又云:太伯冢在吴县北,去城十里。未详孰是。”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也说:“太伯墓,《皇览》云:‘在吴县北梅里,去城十里。’刘昭案‘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二说固不同,今吴县、无锡县俱有梅里之名,未知孰是,要当访之耳。”自从东汉吴郡太守糜豹在无锡梅里重修太伯墓、庙后,二千年来无人对此有所怀疑,那末怎么又会在吴县北十里冒出一个“太伯墓”和“梅里”呢?其实这是一种古代十分常见的地名迁徙现象。地本无名,地名本是当地居民起的,古代先民举族而迁或迁都徙国后,往往用旧名称呼新地。吴县境内的梅里地名与太伯冢,可能是阖闾迁都后从故地移来新都的。由于吴国迁都后很快就亡国了,新地名、新古迹未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到了宋代,学者就不知其详了。这次在小真山发现的春秋晚期墓,当然不可能是太伯的真冢,但如果文献记载不错,那末大真山主峰上的大墓可能是太伯的纪念冢。

虽然春秋晚期吴国诸王墓不在真山,但《吴地记》记载在阳山“东三里有夫差义子坟十八所。”古籍记载的里程数往往不精确,但所记夫差义子坟的方位与真山墓地正相合。《吴地记》记载阖闾长媳齐女因思乡早夭,死后葬于常熟虞山,与仲雍周章墓相近;又记载夫差小女幼玉结怨而死,夫差用金棺铜槨将其葬于阖门外,该墓俗称吴女坟(即今虎丘山西南的金鸡墩)。由此可见,以子孙后辈坟墓陪葬

先辈王陵是吴国习俗。以此推论,真山一号墓墓主当是吴国晚期王族贵胄,而整个真山墓区是由一座太伯纪念冢和若干贵族陪葬墓所组成的。

在真山还发掘到几座汉墓,但这里不可能是汉初的吴王陵区,因为汉初吴王刘濞谋反被诛,封国被削,决不会有高规格的墓葬。不过《吴地记》又载曰,阳山“东二里有汉山阴县令陆寂坟”,“县西北三十里有汉豫章太守陆烈坟。”可见真山在隔了一个战国时代后很可能又成为汉代地方达官贵人的墓地了。

当然,上面所述仅是试探,真山墓地那些墓主究竟是谁,还有待于全面发掘来揭示,我们拭目以待。

①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②阿米等:《真山——吴王陵?》,《苏州日报》1993年1月17日。

③张敏:《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上接第37页)

#### 参考文献

1. D. I. Slobin, 1979, *Psycholinguistic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Second Edition

2. *Applied Linguistics*, 1989—1990, 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H. Stern, 1983,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D. Hymes, 1971,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5. Jack Richards, John Platt, Heidi Weber, 1985,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ongman World Publishing Corp.

6. Brenda D. Smith, 1985, *Bridging the Gap: College reading*,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7. Richard E. Mayer, 1987, *Educational Psycholog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8. 桂诗春, 1992, 《认知与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年第4期。

9. 桂诗春, 1992, 《认知和外语测试》,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年第3期。

10. 桂诗春, 1991, 《认知和语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1年第3期。

11. 桂诗春, 1991,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2. 彭聃龄, 1991, 《语言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何自然, 1988, 《语用学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14. 黄次栋, 1988, 《英语语言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5. 刘润清等, 1988, 《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 测绘出版社。

16. 胡壮麟等, 1988, 《语言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7. 罗竞, 1992, 《美国关于外语阅读理论的发展》,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年第3期。

18. 许常凯, 1989, 《谈培养“预测能力”的心理语言学基础》, 《铁道师院学报》社科版, 1989年第1—2期。

19. 许常凯, 1990,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外语教学若干问题》, 《铁道师院学报》社科版, 1990年第4期。

20. 章兼中, 1983, 《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顾桂菁 E. Catbonton, 1992, 《在中国应用交际法的实验》, 《外语界》, 1992年第3期。